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专题研讨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青年择偶观念变迁的三个历史阶段

最后更新: 2008-6-15

一、去政治化, 迈向自主, 追求财富: 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

1. 摆脱政治本位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年“择偶”历来是家庭本位、甚至是家族本位的, 择偶的目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形容的“传宗接代”之需要, 择偶标准首先要听从“父母之命”; 到了文革时期又加上了“政治本位”; 在“文化大革命”中, 对“政治因素”尤为重视, 青年择偶首先要考虑对方“阶级出身”, 家庭有无“政治历史问题”, 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粉碎“四人帮”、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以“政治”为首要条件的观念逐渐淡薄, 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自主”意愿仍然不是主流, 尤其在农村青年中更是如此。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曾在河北、山西等九个省24627名农村青年中调查, 在择偶方式栏目中, 表示愿意“自己认识, 完全由自己做主”的只占23.2%; 同一年(1983), 在北京等五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城镇青年不再由父母物色“好女婿、好儿媳”, 也不喜欢由婚姻介绍所牵线进入“爱情玫瑰园”, 而是希望由同学、好友介绍“对象”的也只有一半左右。这说明两点: 一是择偶的“自主”观念还未完全普及; 二是城镇青年的“自主”观念先行一步。虽然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但这一时期的农村青年在择偶观念上的变迁, 并没有城镇青年那样更普遍地实现“我的事情我做主”。而1986年在全国29个省的3402名农村青年的调查中, 则有1857人愿意“自己认识, 完全由自己做主”, 比例高达54.58%, 此后, 经验数据普遍表明, “自主”择偶观念深入人心, 普遍成为城乡青年在择偶时考虑的“权利”。

2. 门当户对与物质财富的追求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 青年择偶虽然走出“政治化”的阴影, 但“门当户对”仍然是普遍的“硬框框”, 其强调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是第一因素。1976年到1982年, 上海比较通行的择偶标准是“海、落、空”, “海”是有海外关系, “落”是落实政策对象, “空”是有了供应青年人组建家庭的空房子。房子和家庭经济成为首要因素, 是文革造成的贫困与人心不稳的根本反映。上世纪80年代中期程乃珊的小说《蓝屋》的流行,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青年尤其是上海、北京之类的大城市青年, 对拥有大宗遗产或海外汇款收入的“蓝屋青年”的强烈向往。这是城镇青年择偶观念物质化、硬件化的社会映射。

虽然这一时期的经验调查数据普遍显示, 在性别差异上“男高女低”是一个主流的婚配模式, 即男性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方面普遍高于女性, 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造成的。但是, 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主外带来更多的收入与社会地位)等观念有关, 但更是与当时中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有关。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1982年有15-29岁的青年2.92亿, 其中未婚青年1.796亿, 其中男青年1.016亿, 而女青年只有0.78亿。这说明性别比失衡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找老婆难、打光棍不单单在农村是个揪心的话题, 在城市也不乏其例, 所以“男高女低”是女方市场资源短缺的表现。

当然, 社会的“大数定律”中总是不乏“新新人类”。早在1981年北京大学曾经进行过一项民意测验, 其中一个女研究生说:“夫妻之间更重要的是心灵上沟通和事业上的共同追求”, 这在当时可谓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新眼光, 她们摆脱了“物质化追求”的“世俗”, 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似乎预示了中国后来改革发展过程中青年择偶的变迁方向。

二、由外在转向内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物质利益的刺激得到加强, 经济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甚至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占据人心。

1. 财富观念的进一步强化

这一变化体现在择偶标准上, 就是物质和经济利益在择偶过程中得到了大大强化, 城乡青年结婚都要求父母或单独由男方提供“四大件”作为结婚的前提, 农村青年大多要求的是旧四大件, 即三转(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一响(收音机); 而城市青年已经开始更新换代, 要新四大件(电冰箱、黑白电视、石英手表、洗衣机)作为婚姻缔结的必备品, 同时农村青年在择偶过程中传统观念还影响显著。钱能、李崇建通过对张家港市400多名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青年进行调查分析发现, 90%的青年工人主张自由恋爱, 但是, 50%的男性都希望女方最好是贤惠、朴实、任劳任怨, 只有11%的男性选择“有技术、文化高、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 在结婚时都主张找一个“现成的媒人”——传统中国农村中媒人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婚姻的公众认可甚至是“合法性”。这一时期的经验研究数据普遍表明, 城镇青年在择偶中要求对方有住房和居住地为城市的比重上升, 求实惠的倾向明显, 权衡经济因素的比例递增。农村青年当中对体貌的要求都不是太高, 而是以“一般化”为主, 但门当户对却是“硬框框”, 尤其是身在农村但改变了户口的农村青年教师的择偶观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村青年教师中85.7%以上的人都要求对方是城镇户口, 这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现, 更是对经济物质条件的切实考虑。

2. 由外在转向内在

择偶标准的“物化”取向,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逐渐由原来的外在物质条件转变为把内在的、潜在的发展条件作为第一因素。支持这一结论的经验研究首先是钱铭怡等人的一项研究。钱铭怡等人通过系统抽样的方法对《中国妇女》杂志1985年至2000年15年间刊登的131例征婚启事采用统计学进行定量分析后认为, 女性择偶时仍旧最为关注男方的社会经济条件, 但是体现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 表现为对男方学历和职业的关注稍有下降, 而对财产、事业的要求有所上升; 同时对对方身高的要求有所下降, 体现出当时择偶趋向于“实惠化”的倾

向。对配偶的修养、人品的要求呈上升趋势，体现女性婚恋观念的改变和提高。徐安琪通过1996年在上海、哈尔滨对3200名已婚男女的入户访问调查发现，调查对象最重视的标准是健康、老实可靠、性格相投和温柔体贴。同时一些物质化条件：如教育、职业、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条件和容貌、身材等外貌条件也备受青睐。对经济取向最敏感的影响因素是性别，女性在择偶中更关注未来配偶的经济实力。

特别是直接针对青年人群的经验调查，也证明了青年人对配偶的财富追求出现了“从对经济物质资源的直接衡量到对发展潜力考量的变化”。尚会鹏通过对中原一个村落的考察，研究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社会中择偶标准的变化：由重家庭条件转为更重个人条件；从以家庭意志为主向以个人为主变化；出现了对学历和技术的重视；审美观在迅速接近城里人。一项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对广西部分县市720名农村青年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受改革开放环境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农村青年的经济意识增强，社会交往范围扩大，择偶标准由原来的重视婚姻的外在条件如“门当户对”和“身强力壮”等转变为重视婚姻的内在价值如“情投意合”和“有头脑、有文化、会持家”。另一项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山东12个地区农村青年的调查表明，农村青年的择偶主要强调个人因素，尤其是个人的品行、身体健康状况、个性、能力及学识等，而相对忽视家庭、社会地位等外在因素。

陆宏英、方奕通过对1997年1月到2001年2月的《家庭》等杂志上刊登的1328则征婚启事进行内容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征婚者的求偶条件依次是：内在修养（39.60%）；年龄（23.62%）；体貌（12.32%）；身高6.86%）；初婚（6.75%）；地区户口（2.79%）；其他的约占8.06%”，这说明内在因素已经成为择偶标准的第一因子。

通观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青年择偶观念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青年交流范围的扩大，青年择偶中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在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的同时，由最初片面考虑经济因素逐步转向个人素质内在条件。也有人认为，从表面上看青年人对配偶经济收入的考虑减少，他们更关注潜在“经济因子”——因为学历、事业心和发展能力等因素，实际上也是经济潜能。我们认为，虽然这一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从直接的经济因子转向诸如学历、能力的社会因子本身，就表明了“眼光”的变迁：不再以现成的外在财富为取舍。

三、物质财富、人力资本、情感的通盘考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1. 新的改革背景与财富理念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越来越深入地推进着三大领域的改革，即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卫生和医疗卫生改革。这三大改革的深入推进，在普通老百姓当中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加“深入”：国有企业改革使城镇国有企业工人大批下岗，下岗早期由于国家补贴等原因在生活上还不算太艰难，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次性结算甚至是一刀“断奶”是普遍的下岗待遇，再就业的困难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使千千万万的青年人看到了人民币重要性的真切体现；教育改革，使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大大增加，尤其是学费的不断提升，学生在校生活费用的逐步加高，以及学校教育之外子女培养成本的节节攀升，使青年人在选择配偶时不得不“务实”，浪漫和爱情并不能奠基教育成本；医疗卫生改革，使健康养护成本越来越超出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能力，医疗行业公开的内幕和普通入看病难已经使人们见怪不怪，有钱才能好好看病成了公认的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三大改革的影响给人们在择偶观念上带来的直接冲击是“钱太重要了”，“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波及到青年人择偶观念上，就是职业、收入、住房、财产等物质条件的重视程度和期望值在择偶过程中重新回归。

2. 多元化的通盘考虑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总体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婚姻质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为众多青年择偶时对美好生活憧憬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情感、品质与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学历较高的择偶者越来越倾向于“通盘考虑”，他们更重视对方家庭的文化背景，对未婚伴侣的要求，无论是生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还是对人品个性和对方相容互补的考虑，均多于文化程度较低者，而且有更大的概率关注对方具有现代气质的人品个性。以征婚的方式进行择偶的青年对自己状况的描述也大致是通盘介绍的：首先是“外在生理条件”，其次是“物质社会条件”，再次是“双方的相容互补”，最后是“内在品格条件”，让有意应征的对方有个全面的考虑。

农村青年由于以在外打工为主流，挣钱与寻求发展空间也是第一要务，择偶避开这一首要主题。但是相貌、性格、人品等非经济条件也并非不重要。全面综合考虑也是普遍的模式，可以总结为既重视“家庭经济背景”，也重视“个人素质”；既注重身高、相貌，也重视“有情人才能成眷属”；既重视人品，也看重“聪明能干”。总体上讲，流入城市之后的再社会化，使她们在农村形成的传统择偶意识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开始考虑精神孤独的排解；但由于生存压力，她们又不得不在择偶过程中考虑能否脱贫致富。

从总体上说，职业、收入、固定财产（房子、车子）等经济因子的回归也是常态，经济因素在世界各国的婚配模式中都是重要的。经济与健康、性格、情调、相互理解等都是婚后幸福的重要根源。“门当户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更成了富有阶层择偶模式的走向。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也是常态，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德所说的那样，“人们确实可以相信两个家庭所接受的联姻的条件往往是双方在经济上或社会上门当户对”，“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姻’，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青年人婚恋观念走向成熟的表现。

注：节选自王水珍撰写的《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择偶观念的变迁》，该文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供稿）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